

# 含山革命故事选

第四辑

中共含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 目 录

|               |      |
|---------------|------|
| 张云逸义释赵保顺..... | (1)  |
| 智取螺丝滩.....    | (5)  |
| 赵卓三挫司绍珍.....  | (9)  |
| 陈敬华巧破反间计..... | (18) |
| 营救.....       | (25) |
| 生死关头的决策.....  | (29) |
| 除奸记.....      | (34) |
| 难忘的记忆.....    | (37) |
| 先渡为快.....     | (43) |
| 关门擒匪.....     | (44) |
| 周心抚智斗民团长..... | (48) |
| 薛汉昭归正.....    | (52) |
| 鞭子引起的义愤.....  | (56) |
| 虎胆盗枪.....     | (59) |
| 糊鬼子.....      | (64) |

# 张云逸义释赵保顺

晏道行

1943年7月，皖江抗日根据地已巩固地扎根在长江中游的皖中大江两岸，日伪虽数次集中兵力“扫荡”，皆以失败告终。国民党顽固派中安徽桂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断集中兵力向新四军第七师所属各部进犯，他们和日伪由暗中勾结到公开合兵，企图打垮新四军第七师，毁坏这块经浴血奋战数年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第七师所属各部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抓住时机，予以有力还击。本文所要说的故事就是还击国民党顽固派中的一节。

7月的一天中午，蝉鸣深树，骄阳似火。在巢南某个山村的大树下，坐着四五个人，有的穿着褪了色的灰军装，谈笑自若，有的穿的是崭新的纺绸褂裤，神色不安。这就是新四军张云逸副军长等正在接见国民党安徽桂系原古河行政公署专员赵凤藻派来的代表。赵凤藻为什么要派心腹深入七师内地求见新四军高级领导呢？原来前几天他率领顽军进犯新四军失利，独子赵保顺夫妇反被新四军俘虏，虽紧接派重兵并勾结伪军同时出动，企图夹击新四军巢北部，结果扑空，一无所获，黔驴技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卑躬屈膝，委派心腹找新四军高级领导人谈判，要求释放他的宝贝儿子夫妇。

“敝军唐突，误入贵军防地，请您谅解。”穿绸褂裤的赵凤藻心腹心神不安地解释说。

“赵专员一再表示歉意，请贵军宽容。”另一个国民党桂系代表接着说。

“哈哈，这就不对了。你军驻古河一带、怎么一下子去了那么多人，进攻巢湖北我部巢支队，你们明知巢北是我军防地，却不宣而战，远距离奔袭。第一次打了那么个仗，第二天你们又和伪军勾结，出动大批部队，两面夹攻巢支。然而自绝于人民的人是必将失败的，广大抗日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你们理所当然除了丢下俘虏一无所获。”张云逸副军长理直气壮地驳斥。

“是的，是的，总之是我方欠妥，赵专员说，只要贵军放人，愿先给贵军10挺机枪，100支步枪，10万发子弹，至于别的什么条件，请阁下提出，我们回去转告，遵照办理。”一阵沉默，国民党桂系代表窘态难堪，理屈词穷之后，另一心腹惶惶地站起来说。

“条件，什么条件？！我们是抗日部队，大敌当前，只要共同抗日，枪口对外，我们就是朋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告诉赵凤藻他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为民族大义着想，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只要他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我们就成为真正的友军。至于我军对待俘虏，一不会虐待，二不会滥杀无辜，除对人民罪大恶极者外，一般都会宽大处理。”张副军长站了起来，来回踱步，挥手讲话。

赵凤藻的两个代表一听张副军长此话，紧张的神情顿时松缓了下来，连忙躬身施礼说：“贵军真是仁义之军、信义之师，佩服、佩服！”

“一切重在行动，我们早已领教过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说的好听话，暗下里却背信弃义，认敌为友。人民反对，我们也不答应。”张副军长威严地似有所指地说。

国民党两个代表非常尴尬，欲言又止。稍停，一代表很有礼貌地问：“照阁下的意思是只要今后赵专员不冒犯贵军，一心抗日，就可放人？”

“是的，抗日是中国人共同的神圣职责，大家枪口一致对外，还有何仇！”张副军长大义凛然地说。

“好，我们一定遵照办理，何时放人是否可以请阁下确定！”国民党桂系一代表心中不解地想怎么一点东西不要，天下那有这么便宜的事似信非信地试探着问。

“我们说话是算数的，至于放人的具体事宜由巢湖支队三大队李参谋长办理，三日后即可办毕。不过你们回去还要对赵凤藻言明，第一抗日要真心，我们等着看行动；第二今后日伪和顽方若进犯我军，请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事先和我们通个信。我们知道赵部也是在执行蒋介石之流密令，不得已而为之，这方面我们会谅解，但事先通个信比不宣而战就能说明问题的真象，其它方面请赵风藻自裁之。”张副军长郑重地说。

“当然，当然，阁下高风忠言，我们一定转告，相信赵专员将会如实办理，见诸今后行动。”两个国民党桂系代表很受感动地答道。

一个多小时的谈判，顺利结束。张副军长命令部下送走了赵风藻的两个代表，又找来巢湖支队李元等人，听了大家的情况汇报，询问了一些情况，对今后的反顽斗争、抗击日伪作了具体指示后，翻身上马，警卫员们随其一道奔向七师师

都。不日，赵保顺夫妇平安回到赵凤藻身边。

赵凤藻及其周围人皆为新四军为抗日明大义，讲团结的精神所感动，自此后，他们着实大部分履行了诺言。从此新四军团结抗日的义举在安徽国民党桂系军队中悄悄地迅速地传开。

## 智取螺丝滩

许仁湘

1942年4月，新四军第七师含和独立团在含山县福山乡竹园蒋村成立，下辖一、三、五、七4个连，约200人。当时，含和的形势是严峻的，我军活动区域仅有陶厂至福山的一线之地，北有顽军，周围日伪据点林立，处于两面夹击之中。而含和独立团的任务是必须迅速向和县北乡及江浦发展，打通与二师的联系。因此，能不能打开局面、完成任务是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这课题中如何迈开第一步又是问题的关键。团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首先从和县螺丝滩伪据点开刀，打开通向胜利的缺口。

何以首先攻打螺丝滩是制胜的决策呢？这是为螺丝滩当时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从大范围讲，螺丝滩处于陶厂、南义、百旺市、高庙等日伪据点中间，攻了它就等于在日伪心脏中穿了个窟窿，打破其对这一地区封锁。从小范围而言，螺丝滩东北的功剩桥、新塘日伪都未设立据点，是我游击区域，经常受到螺丝滩伪军骚扰，群众非常不安。再则，这里靠近我活动中心区陶厂地带，又是鱼米之乡，攻下它不但可解决我吃饭问题，而且可解除我“户槛之忧”。再从螺丝滩据点与守敌来看，这里筑有4个碉堡，伪军头目夏复初与伪军团长曹良文是拜把兄弟，又是主力，骄横狂妄，不可一世。骄兵必败，打了他可收“杀鸡警猴”之效。

螺丝滩虽说是块肥肉，但要将它吞下，困难也不少。独立团总兵力不足200人，伪军是两个大队，而且碉堡雄踞水网地带之上，高沟深垒，构成交叉火力，占有“居高临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有利地形。但独立团长马长炎深知，在抗日游击战中，弱小是我军的弱点，地利也往往为敌伪据有，而我军得人和，有群众支持，有游击战战略原则指导与实战经验，弱可化强，不利可变成有利。从这一思想出发，经过与地方党组织多次侦察地形、协商研究，制定了“引蛇出洞”、两头拦戴、歼敌于水网地带作战方案。

“引蛇出洞”怎么引法，由谁来引？这要从王万法游击队说起。当时，王万法游击队刚成立不久，不过十几人枪，按照独立团的部署，从5月下旬起，断断续续袭击螺丝滩伪据点。伪军自恃人多，总是穷追猛扑，游击队又总象丛林雀群，一轰而散。6月初，游击队天天去袭击，惹得伪大队长夏复初暴跳如雷、赌咒发誓要把游击队一网打尽，方解心头之恨，并悬出赏格，无论是击毙还是活捉，均论功行赏。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那以后，伪军就争先恐后出动，希望立功受赏。他们哪里知道螳螂捕蝉已有黄雀在后，复灭的命运已一步步向他们走来。

6月14日这天终于姗姗来临了，这是决定攻打螺丝滩的日子。下午4点，王万法照例带领游击队到螺丝滩碉堡周围打枪、扔手榴弹、宣传伪军投诚政策，好一会不见动静。王万法有点焦急，带领战士匍匐到濠沟附近。伪军自以为得计，突然放下吊桥，拥挤着呼喊奔驰而来。大队长夏复初夹在伪军中督阵，大叫：“快、快！给我抓活的”。一向行动敏

捷的游击队，今天却一边还击，一边缓缓地向孙家大桥撤退，致使伪军以为在这水网地带，狭窄的河道两旁，游击队今天插翅也难飞，故越追越猛，转眼间已有200多伪军过了孙家大桥，距我河北埋伏仅50米。此时，歼敌时机已到，独立团信号枪一发，布置在桥南桥北4挺机枪立即怒吼起来，三连正面阻击，弹发如雨，土石横飞，压得伪军抬不起头来。七连后面拦击，炮火猛烈，气势如山，伪军不得后退半步。你想，那些平日只会贪图享乐的伪军，此时只有逃命要紧，象炸了窝的鸭子，慌不择路、互相践踏，被踩伤的、击毙的、跳河的乱作一团。大队长夏复初在晕头转向之余，强作镇静，命令伪军支起旱鸭子机枪，压我火力、死守桥头。殊不知埋伏在桥下我军手榴弹早已飞向桥头，顿时桥上血肉横飞，重机枪脚架也被炸落河中。此时，夏复初嘶声力竭、别无能耐。在兵不由将的情况下，夏复初被流弹击中，毙命河中。蛇无头不行，伪军更加慌乱。这时我军冲锋号响了，三连迅速占领了桥头，断敌后路，并与沟北七连缩紧了包围圈。敌后继部队，向东南溃跑，妄图强占汤陈家，被我一连杀回。这时，天已黄昏，群众挥舞着大锹、锄头从四面八方涌来，配合我军追击逃敌。整个战斗前后只经历2个多小时，俘毙伪军150多人，缴获步枪1百多支，我军只有数名人员轻伤。

至此，也许有人会问，螺丝滩据点伪军毕竟是曹良文的主力，我军又处于弱势，引出碉堡后能否有效歼击？外围的日伪据点是不是来增援？独立团是不是侥幸取胜？这些问题在战前马团长作了慎重又慎重的考虑。马团长认为螺丝滩周围是水网地带，据点南面有一条从东到西的水沟，沿沟埂150米处有一座孙家大桥，河沟以南有耿、彭、赵等村庄，

沟北是水网地带，只要把敌伪引过孙家大桥，南堵北击，敌伪既无地形利用，又首尾不能相顾，制胜把握很大。为了万无一失，还把有作战经验另有公务在外的独立团副团长顾鸿从外地请来，共研战斗部署，反复推敲，形成了三连攻，七连堵，一连打援的战斗布局。三连是独立团的主力，战士大部是皖南突围的红军，七连是江北游击队一部，这两个连长都是皖南突围的红军，战斗勇敢顽强，富于实战经验。这两个连部署在两头，象一把钢钳，在强力反冲下，仍能慢慢收拢。战斗安排在下午4点，也是别有匠心的，战斗只要能坚持3个小时，天就黑了，即使吃不掉伪军，其它据点日伪军也不敢贸然支援。战前的部队行动是绝对秘密的，三连利用采菱盆渡河，隐蔽在桥南荒圩内村庄，七连化装隐蔽在桥北，另派一个班隐蔽在桥底，直到战斗打响，敌人一直蒙在鼓里。战争贵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当夏复初进入我埋伏圈内，任他三头六臂也无力挽救覆灭下场。

螺丝滩战斗结束后，我军按照俘虏政策对伪军俘虏进行教育后，愿意参加我军的编入连队，愿意回家的一律发给路费。伪军中有一个姓洪的班长曾在黄山寺被我军俘虏过，因念他家口多，当时就多给了点钱劝他回家后经商，这次被俘后批评他屡教不改，那姓洪的竟说：“我对新四军也有贡献，两次俘虏就给了二条枪。除此之外，还在相好的兄弟间宣传当新四军俘虏不要紧，带去的枪折价付钱，要回家给路费，要养老婆孩子给钱做生意。”大伙听了都笑了起来。

夏复初一死，螺丝滩伪军据点瓦解，五显集、后港桥伪据点自动撤离，独立团取得了向北向东发展立足之地。有人把螺丝滩比作一块肥肉，这话今天回忆起来仍意味深长。

## 赵卓三挫司绍珍

许仁湘

赵卓是安徽怀宁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抗战爆发后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受省动委会派遣任含山县动委会指导员。他的任务是专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在党内只与中共含山区委书记刁筠寿保持联系。

赵卓来含山的当天晚上，便与中共含山地下党负责人取得联系。回到下塌处，毫无睡意，与刁筠寿交谈的情景一幕幕地在脑际中翻动着：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司绍珍、国民党含山县长邓贡三两个显明不同的形象在他眼前时隐时现。他觉得刁筠寿提出“联邓防司”实为上策证实了他白天与邓贡三会晤时所留给他的印象，看来与邓贡三搞好关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当务之急。

赵卓来含山时，国民党中央已密订《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主政安徽的新桂系也竭力推行反共政策。在含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司绍珍正卖力宣扬“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司绍珍利用他在动委会内兼任宣传部长的职务，安插亲信，排斥异己，对赵卓来领导动委会工作十分不满，发誓要撵走这位单枪匹马外来户，司绍珍与赵卓的斗争便从这里开始。

## 集体辞职的闹剧收场

“集体辞职”是司绍珍策划驱赶赵卓的第一着棋。在司绍珍看来，动委会内他的亲信占有绝对的优势，轰走赵卓是时间迟早问题。赵卓一到动委会，司绍珍便唆使他的亲信处处给赵卓设置障碍；赵卓要搞为政清廉，他们就故意多报差旅费，一经批评便说是打击异己；赵卓要组织动委会工作人员学习抗日有关文章，他们便故意缺席，指控为赤色宣传；赵卓要搞动员全民抗日，他们便态度消极，诬称是共产党的一套。在这些问题上，邓贡三听了只是不露声色，往往一笑置之。

司绍珍深知撵走赵卓需要邓贡三支持，但他又觉得邓贡三曾在省军界、司法界混过多年，自视甚高，况且党政不和由来已久，争取邓贡三支持他司绍珍谈何容易。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策划动委会工作人员“集体辞职”妙策上，召集他的心腹作了部署，以为这样赵卓便不打自退，邓贡三自然会请他出面收拾残局。想到得意处，司绍珍嘿嘿冷笑起来。

含山县动委会设在含城南门，工作人员30多人，往日到了办公时间，总体上倒也热热闹闹，可是这天却冷冷清清。原来，司绍珍党羽都集中到县衙大院内吵吵嚷嚷，声称不与赵卓合作，请县长批准他们“集体辞职”。辞呈很快转入邓贡三手中，邓贡三接见了众人，用手势压停了人声，打着苏北口音叫众人散去等候处理。这件事赵卓当然很快知道，但他觉得申辩之机还未到来，就静观事态的发展。

却说邓贡三详细看了辞呈后，不觉沉思起来：他印象中的赵卓不象是辞呈中所说的那样低能，动委会工作在赵卓来

后很有起色，赵卓和人交往也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诚实谦逊、廉洁奉公，克俭自持，是个人才。然而又为何有这么多人要求辞职呢？思来想去，倒是百思不得其解，为慎重起见，遂决定同赵卓面谈。

含城本来是山城小县，旧有“大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的民谣，“集体辞职”风波很快成为轰动全城的热门话题。那些亲日资敌分子，倾销日货奸商，与司绍珍枝牵蔓连的劣绅，幸灾乐祸，等着看笑话。而中共含山党组织则与赵卓面商对策，决定将计就计打开一条新路子。

赵卓根据区委借“集体辞职”来纯洁内部组织意见，决定利用邓贡三与县党部矛盾，争取邓贡三支持自己。这样，必须从县党部阻挠抗日入手，才名正言顺。同时要使邓贡三对动委会工作无后顾之忧，这样就会毫无顾虑地支持他的工作。所以当赵卓应邀和邓贡三面晤时，赵卓隐而不发，而邓贡三却急于要听赵卓对“集体辞职”的见解，一再催促，赵卓才侃侃而谈：

“辞职事情发生决非偶然，是积怨与排外情绪的一次大表演。我们查禁日货，是谁又把查禁的货物暗归原主？我们打资敌，查处民族败类，是谁保护这些资敌者？又是谁叫嚷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争，企图给抗日青年戴上‘红帽子’！我们提倡为政清廉，是哪些人一再多报冒领？我们发动民众抗日组织民众团体，是谁借口民心未定，设置种种障碍？邓县长是动委会主任委员，我赵卓是指导员，反对我赵卓，邓县长岂不考虑这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若说动委会工作，我赵卓来后，从秩序、学习、宣传和组织发展等方面都尽了微薄之力，这些无须我多说，是谁别有用心，制造混乱，

邓县长比我清楚？他们不是要逼我辞职吗？现在为时尚早，我不能不明不白离去，目前需要的是搞清原因。”

赵卓的申述邓贡三没有即刻表态。赵卓走后，他觉得赵卓所言极是有理，所述情况也是属实，“集体辞职”确实是事出有因，是司绍珍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的“杰作”。不过他亦知道司绍珍是含南五大乡绅之首，很有地方势力，不可轻易得罪。现在他邓贡三再也偏颇不得。应司绍珍所请给赵卓加上“莫须有”罪名，断非他邓贡三所为，他若站在司绍珍一边，结果必然与乡绅合流，使吏治败坏，于已于国不利。而赵卓与自己一样，皆是外来人，置身于含山地方势力以外，为了抗日，应该团结象赵卓这样爱国上进的青年，维护赵卓才是上策，当今得人不易，得一位有力的助手就更不易。然而如果批准集体辞职，今后动委会工作怎么办？这个问题答案在哪里？邓贡三决定再听听赵卓的意见。

第二天，赵卓再次应邀来到邓贡三的办公室，邓贡三坦率地说明他的想法，赵卓胸有成竹地说：“请邓县长相信，大敌当前，团结御侮的人总是多数，搞所谓‘集体辞职’实是‘冀豆之争’，鼠目寸光，不如应其所请。至于动委会的工作，邓县长放心，只要赵卓还在干，决不使工作受损”。最后赵卓半开玩笑地说：“中国有所谓‘因祸得福、否极泰来’这句古话，我赵卓相信，不知邓县长相信不相信？”邓贡三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连说：“相信！相信！”。

赵卓借助邓贡三的力量，终于搬走了早就想搬走的“拦路石”。司绍珍万想不到邓贡三会批准“集体辞职”，挨了闷棒，别提有多么懊恼。动委会内通过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从工作团选调一批中共党员来加强动委会工作，动委会的工作

生气活泼，邓贡三和赵卓之间关系也因比更加亲密

### 导报牌子被砸的争端平息

利用导报牌子被砸事件来整垮赵卓这是司绍珍下的第二着棋。《含山导报》是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机关报，在含山征求到不少订户。因它只收钱、很少出刊，被称为“含山倒报”，又因其东抄西摘、毫无生气，又被群众称为“含山抄报”。群众不满情绪日炽，终于导致《含山导报》牌子被砸。

《含山导报》牌子被砸的当天，该报编辑司有典垂头丧气，而司绍珍却嘿嘿冷笑，一条借机整垮赵卓的毒计即刻形成。

导报牌子被砸很快在含山掀起轩然大波：那些国民党右翼分子，诬称是共产党的蓄意破坏，要求严惩不法之徒，并给邓贡三施加压力；司绍珍和司有典更是虚张声势，一唱一和，在邓贡三面前叫嚷党报被砸，非同寻常，硬说赵卓是导报牌子被砸的幕后指挥，要挟说：若不迅速处理，必不甘休。其实，司绍珍心里明白，含山各界早对《含山导报》不满。种种表演，只不过吊死鬼搽粉——死要面子而已。

然而，邓贡三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越是社会上人言汹汹，司绍珍越是气势灼人，他越是显得宽松冷静，越是认为少数为赵卓说话的人有理。他以“事关重大，据实处理”为由，挡住了进攻者一次又一次的诘难。

作为赵卓和含山党委组织，把司绍珍的诬陷当作一件大事。赵卓首先找来动委会干事陈秋宾，批评他莽撞行事。指出司绍珍对爱国抗日青年向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管

《含山导报》办的怎么样，你们砸烂了招牌，总是一起政治事件，为司绍珍提供了诬陷寻衅之机，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从目前社会上的舆论导向及司绍珍所作所为来看，我们已非常被动。现在怎么办？我们要后发制人，必须如此这般，只要压下“二司”的气焰，风波自然平息。陈秋宾心领神会离去。

《含山导报》牌子被砸，邓贡三虚言搪塞，司绍珍日日坐催，坚持要揪出后台，可是司绍珍得意的梦并未做得很久。打破司绍珍的梦要从国民党含山县财委主任蒋勉庵说起。

蒋勉庵是含山乡绅之一，平日对司绍珍把持党权，身兼数职，擅作威福，颇为不满。在一次审查财委帐目时，发现身兼含山民众教育馆馆长司绍珍重领了一个月的经费，但不愿出面揭发，却暗地告知以青抗秘书公开身份在动委会活动的刁筠寿，希望合作，想借助青抗的力量打击司绍珍，让他自己来身兼民众教育馆馆长。导报牌子被砸事件发生后，为了后发制人，刁筠寿与赵卓对重领经费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司绍珍重领经费属于贪污性质，结局可大可小，闹大一点，在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大闹情况下，把司绍珍赶下台是可以做到的，采取谨慎做法，在一定范围内把司绍珍贪污秽行揭露出来，记录在案，暂不作最后处理，狠狠抓住司的小辫子，可以压下司绍珍的威风。最后认定前者虽然痛快，但可能过多地暴露进步力量，引起反动当局疑惧，在反共倒退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换一个新来的县党部书记长也决不会是好东西，倒不如留下劣迹多端的司绍珍，容易对付。后者比较稳妥，抓住了司绍珍把柄不放对今后工作有利。

方案既定后，刁筠寿随即与蒋勉庵通了气。蒋勉庵也随

即邀请刁筠寿、赵卓、司绍珍、陈秋宾、张锡生等参加的财委扩大会议。司绍珍开始认为是例行会议，未作思想准备。不料到会议一开始，就有人建议帐目必须按月公布，逐项审查，多数人立即赞成通过。此时，司绍珍紧张万分，但无力挽回局面。当审查人宣布司绍珍重领经费一事，司绍珍立即神色大变，一会儿说误会，一会儿又说误领，已是语无伦次。蒋勉庵毫不放松，征求与会者提出处理意见。刁筠寿按照预先的计议，提出：先记录在案，封存帐目，下一步研究处理，得到出席会议人员的多数赞同。司绍珍此时又象发瘟鸡一样垂头丧气，无精打彩，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宣布辞去民众教育馆长兼职。若问谁继任民众教育馆长之职，蒋勉庵没有抢到，由赵卓建议，邓贡三任命张锡生为民众教育馆长。此是后话。

司绍珍被赵卓等抓住了小辫子，虽经苦思冥想找不到解脱办法。这时，刁筠寿在运漕组织的青抗会查出刁抱冬私贩铜元资敌一案。刁抱冬是含南一霸，国民党含山县党部执行委员。他被青抗会员押送含山县政府查办时，气焰嚣张地叫嚷：“这是共产党打倒国民党。”请司绍珍出面讲话。尽管司绍珍与刁抱冬向来沆瀣一气，鉴于自己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尴尬处境，不敢出面营救，听任县长邓贡三罚刁300套军装结案。1940年元旦，为痛打落水狗，赵卓给司绍珍一封信“恭祝财安”，引起轰动，然而司绍珍不敢公开对阵。鉴于以下情况，赵卓认为处理《含山导报》牌子被砸事件时机成熟，带着陈秋宾到邓贡三面前如此这般说明事情经过，邓贡三以“自有处理办法”打发走赵卓。

不多久，邓贡三出面处置《含山导报》牌子被砸事件，